

供批判用

## 宗明兰在省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关于开好讨论会的二点意见

一、应该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理论讨论会这一新鲜经验。

“管理也是社教”，这一指示，指明了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都是改造人的机关、教育人的场所。我们上上下下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就是用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实际的办法。首先，它是领导机关直接依靠基层干部和基层理论骨干来讨论全省、全市、全地区提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不就是群众参加了上级领导的一个短期方式吗？其次，领导和群众同讨论，谁有理，服从谁，这不是群众检查监督领导机关的好方式吗？再次，上边一开下边都开，这不是铺设了一条灌输马列主义的好渠道吗？理论讨论会把毛主席批林批孔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其迅速地，极其广泛地，极其有力地灌输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各种充满生气的新事物象海涛一样喧嚣滚动起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幼芽，不可阻挡地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陈腐脏土茁壮地生长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多了。党内走资派集团开始在分化中：顽固派公开声明坚决和邓小平站到一块，梦想让邓小平重新上台，以便保住那个已经习惯了的，感到既安宁又方便的法权扩建起来的“天堂”宝座；动摇分子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思想斗争激烈，犹豫不决；革命分子决心从那个圈子里把腿拔出来，跟随群众的革命洪流前进，坚决不作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所阐明的最新理论鼓动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热流，驳斥了某些人经常说的理论工作是虚的，抓不抓都没有啥的荒唐谬论。恰恰相反，理论就是行动的指南，它是实实在在帮

助无产阶级主宰（率）世界的真理。邓小平在党内有极广的市场，我们不组织灌输毛主席的理论观点，就不足以把邓小平的势力打下，这个势力是时刻准备卷土重来的——我们这一次理论讨论会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战机，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了邓小平势力的反抗翻案之势，讨论了形势，分析了战机，明确了和走资派斗争的几个问题，一定会对全省的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马列主义理论的灌输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按照马克思的这一逻辑思想，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靠着精神上的胜利，走上了统治舞台，今后也只有靠着一系列精神上的新胜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哪个单位，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理论工作减弱了，政治跟不上了，人们的精神就会衰颓下去，那里就一定会出现僵化和倒退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抓住它不放手，毫不放松抓下去。昨天右卫、露天矿、房木、锦州市等都讲了理论讨论会的经验和体会，大家反映很好。我想，他们的经验有三条是最主要的：一是领导要亲自抓，因为理论讨论会是用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管理的实际步骤，它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向群众实行的最生动的教育工作，而且领导在教育人中也教育自己，拜下级、拜群众为师，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行政治工作，所以每一个领导都应该亲自抓几次理论讨论会；二是组织者要学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理论讨论会是为斗争所准备的武器，不能拿自己没学懂的东西去引导人家，更不能拿自己没学懂的东西去蒙蔽人家，应该自己带头下苦功读原著，引导讨论者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上澄清一些糊涂观念，明确下步斗争目标，统一大家斗争意志，谁不学习，谁就没有资格组织这样的讨论会。三是要调查研究，因为理论讨论（会）是斗争前的武装和组织，是舆论的准备，所以要知道敌情、友情、我情，清楚组织谁，向那冲，攻击敌人的什么地方，用哪些力量去冲，没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凭着主观愿望，出个题目，找一些人来争论一气，不知道要干什么，也只能是讨论讨论而已，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搞不好就成了纯理论争论，成了空谈理论的清谈馆。所以，现在不能满足于我们开了很多理论讨论会了，有了不少新的体会了，而应当进一步在斗争中认识和发展这一新生事物的成果。

二、关于要结合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对社教工作批示的精神，组织理论骨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加深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规律性的认识问题。

在我们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的热潮中，两报一刊发表了毛主席六四年对社教工作的批示。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一批示的发表，对于我们加深对党内资产阶级存在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很重要、很及时的。

什么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呢？列宁说：“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又说，“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官僚机关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官僚就是这个统治机关里的大小官吏们，这些官吏是资产阶级保护者和代言人。因为，这些官吏是一伙不耕田、不做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寄生集团，剥削集团，是一个与工人农民的利益完全

对立的集团。所以是官僚主义者阶级。阶级就是集团，这个集团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阶层，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股主要力量。由这样一伙人所构成的官僚机器，完全是靠强力，靠棍棒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剥削的。

当无产阶级粉碎了这个官僚机关，“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层，镇压着剥削者的空前反抗”，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统治阶级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应当是一个消灭了官僚的机关，是一个新型的国家机器，他的工作人员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随时可以罢免的，与工人领取同等工资的社会公仆，它没有任何特权，而是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个机关体现着群众的意志和智慧，是一个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机器是与任何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完全不同的，有一个美国法官，想把中美社会制度作以比较，他说：“我发现完全无法比拟，一切都是新鲜的经验”，“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制度是暂（新）新的制度，是连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比拟的。但是理论变为实践，要在实践上达到理论所叙述的那样称心如意的目标，是必需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办到的。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战胜这种危险的尖锐斗争，所以，旧的官僚陋习就从新的国家机器中复活滋长起来。这种现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是不显著的，但是革命越往前发展，越要接近共产主义建设，这个旧社会的祸害就越明显起来。正如列宁在总结俄国经验时说的：“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官僚主义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十月革命半年之后，即当俄国自上

而下的摧毁了官僚机关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我们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内部已部分地复活起来。”“又过了两年……我们把这种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于是列宁主张由地方，由下层来帮助中央机关有成效地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十分注意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问题，“三反”的时候就提出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提出了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反动作风，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搞官僚主义，见了人一句话没有，就骂人，人家的问题不去解决，农民就要打徧（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那时候就一定要被打倒。群众闹事或者是因为党和政府出了官僚主义，或者是有人煽（煽）动。为了克服官僚主义，要求机关不要搞得很庞大，搞好多部门，搞很多人。特别不要尽把下面得力的提上来，蹲在上面没事做，专门吃闲饭。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中央还发过一个通知，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砍掉官僚主义。一直到四清，毛主席提出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由官僚主义作风到官僚主义者、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说明了官僚主义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说明我们新的国家管理机关是可以重新变成旧的官僚机器的。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不仅说明掌权人由公仆向官僚演变，而且还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管理规范，就其形式来讲它还是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必须要对它加以限制，不限制就会很快官僚化、僵死化、反动化。毛主席的批示以及最新指示，



作打手，充当卫道士的“管理”，造成那个地方，那个单位，那一部分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化，有的就直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地下黑司令部。这种官僚化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发生着，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叫“资产风”。象有些地方把办公变成了为私，你为我办，我才为你办，公事欲办成，必得先“冒沫”，公章刻得萝卜大，不如熟人一句话，造成很多该办的事办不通，不该办的事的就用歪门邪道去搞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种现象不是官僚化的恶果吗？有些地方和部门长期不调查、不劳动、不跟群众见面，主观主义的在那里发命令下指示，把无产阶级生气勃勃的事业淹没在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经常看得见的吗？有些地方领导吹得批不得，骂人、训人、打击报复，靠官架子压人，靠职位吃饭，横行霸道，不讲道理，这种现象不是也经常在我们面前出现吗？这些官僚主义的毒气不就是从我们挂着市委、省革委会牌子的大楼里冒出来的吗？对这种现象不揭发，不斗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何而谈？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委会，我们的各部门都是上层建筑，究竟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促进还是促退？不促进就促退，促进就得打击官僚主义者阶级。所以，毛主席的批示是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大革命，加强国家机关革命化，更准地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我们在讨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时候，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六四年的批示结合起来，就能从国家机关的现状中更清楚地剖析出党内资产阶级在哪里，通过什么渠道，采用什么手段，靠哪些力量在走。

（注：所引革命导师语录均根据原文，未经校对。）